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6.06.002

认识中国的国情:一个经济学视角

赵 泉¹,吴要武²

(1.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48;2.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28)

摘要:特征化事实是经验研究的起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分析方法和经验过程两个维度探讨认识中国国情的办法。分析方法包括理论分析、数据分析和案例分析;经验过程则包括阅读、观察、交谈和思考。只有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并长期坚持,才能掌握更多客观事实,熟悉研究对象及其环境,实现“重要的问题、严谨的论证和新颖的故事”这个研究目标。

关键词:特征化事实;中国国情;经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6)06-0020-08

在2015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罗思高(Scott Rozelle)教授报告了对中国农村辍学问题的研究:三分之一的农村青少年未完成初中阶段的教育便辍学外出打工,他们的知识技能无法适应10~15年后的岗位需求,会成为未来的弱势群体;缺少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会拖累经济发展,使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政府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采取了增加教育投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等措施,但这个难题仍可能无法破解。罗思高教授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及其研究的价值早已为学术界同行所称道。1983年以来,他调研的足迹覆盖了几乎所有县域的农村,将熟悉国情这个优势与理论、方法上的良好训练结合起来,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既做了精彩的研究,还帮助、造就了众多中国同行。反观大多数中国学者,或者缺少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或者缺少对国情的认识,不会找好的选题,也不会做可信的论证,更不要说做出有价值的研究。经济学研究总是从特征化事实起步的,^①是理论与数据(经验证据)之间的对话,研究者对这两个要素要并重而不可偏废。^②因此,学者要

针对研究对象掌握尽可能多的相关事实,远如亚当·斯密和马歇尔,近如罗思高,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对一个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无论是写严肃的学术论文,还是做对策研究,熟悉国情都是必须的。这两类文章表面上差异很大,但都以讲故事说服读者。读者的水平越高越不容易被说服。但作者如果有好的想法,依照学术规范严谨细致地使用证据,大多数读者是愿意吸收新知识的。想法来自环境提出的问题,证据则依靠从环境中抽取的材料和事实。

作者根据多年的观察、思考和研究经历,以劳动力市场、体制性障碍等为例,从经济学视角探究认识中国国情的方法,并探讨如何做有价值的研究。本文设计成两个维度:第一,从分析方法看,包括理论分析、数据分析和案例分析;第二,从经验过程看,包括阅读、观察、交谈、思考等。

一、理论分析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既要掌握一些必需的理论工具,也要把握一些重要的特征化事实。经济学包括理论和研究两个部分。理论抽象地表述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为什么和

收稿日期:2016-10-20

作者简介:赵泉(1965-),女,四川自贡人,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微观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研究;吴要武(1968-),男,河南周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微观经济计量学研究。

怎么样运行,能从中推导出一些明确的预测;研究则围绕这些经验命题进行观测。中国的特征化事实是:转型与发展的初始条件为计划经济体制,发展水平低;因执行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而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分割长期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从马尔萨斯陷阱起步,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了三十多年,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走过了150~200年的路程。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不断吸纳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先是边际产出接近于零的剩余劳动力,然后是边际产出大于零的农业部门劳动者。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边际成本提高,城镇的工资水平也会持续提高。

当农业部门缺少劳动力时,资本会替代劳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水利等投入持续增加,土地会流转并集中到少数农户手里,便利的信息技术能加快完成这个流通过程。这是基本趋势。然而,那些把农地视为保障的农户不愿意出让土地,但又被城里的务工经商机会所吸引,他们会调整家庭成员的劳动配置,让留守的老人、妇女从事农业劳动,自身也与土地保持粘附。现有农地制度和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体制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也制约了城镇劳动力供给。在观察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时,不可忽视农民工出发地发生的变化。

如果缺少理论思维,面对纷繁复杂且快速变化的中国经济就无从下手。相信经济学理论是分析现实问题的有效工具,相信中国人也像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一样遵循普遍的人类行为模式,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信念。那些借口中国情况特殊而认为理论不适用的人,大多数是不懂理论或不会用理论。中国的现实如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一定是中国存在特殊的约束条件,扭曲了实际结果,而这正是需要学者去认真研究的。

我们在研究中偏好发展铁律模型和二元经济模型。发展铁律模型是观察所有国家发展路径后得出的统计规律:发展水平越高,农业劳动者在全社会劳动者中的比例越低。我们经常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放到这个模型里,并分析时间变化和地区差异,一边思考中国发展的历程,一边思考这些变化对所关注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会理解这个模型强大的分析能力,给出千变万化的图景。二元经济模型主要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当然,回顾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同样与这个模型吻合。

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是如何把简单完美的理论和复杂多变的经验事实作对应。^[2]借助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可以推断,初始禀赋为存在城乡分割和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中国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和向市场转型,劳动者的工资在经验上会经历一个上升—徘徊—再上升的路径。

第一次工资上升是因为城镇市场开始发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高收入的非农部门。虽然城镇户籍制度限制了转移的规模,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迅速提高,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提高。第二阶段,城乡分割进一步被打破,农村劳动力以更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超过需求,城镇开始出现失业,这一期间,工资增长速度变缓。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和市场调整,城镇新兴部门进一步扩大,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劳动力市场又供不应求,必须从农业部门吸引更多劳动力,所以工资水平迅速上升。卢锋对农民工工资历史变化的描述几乎就是刘易斯模型的经验版。^[3]

2004年春,当东部沿海传来缺工呼声时,大多数学者断言为暂时现象。不久,我们看到劳动部赴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东南三个地区专家调研组的报告,开始认真思索并重新调整判断: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真的逆转了,困扰中国几十年的“就业压力”开始消失。^[4]劳动部门对数千家企业用工监测调查数据结果显示,企业缺工的比例由2003年的约10%提高到2009年的75%。最先感知到劳动力短缺的企业家开始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政府劳动部门紧随其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督促企业和职工签订书面合同,提供“三险一金”,且2008年颁布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劳动合同法》。把时间因素考虑到二元经济模型里,“刘易斯转折点”如期赴约。

二、数据分析

观察与分析数据结果是认识国情的重要途径。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要结合起来使用,相当于两个平行的证据链条。研究者可从各种途径获取宏观数据信息,如政府的各种公报、年鉴、普查数据等;企业的定期数据信息发布。汇总数据能让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大致判断。做研究时,要格外注意数据发布单位如何定义指标及其采用的口径和数据调整。大多数研究者偏好微观数据,一是变量定义良好,二是可灵活运用。今天,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能够使用的微观数据越来越多。

(一)数据的特点与适用性

任何(微观)数据都是在一定调查目的指导下设计和搜集的,无法照顾所有使用者关心的问题。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微观数据都有长短,有经验的学者总是在充分评估后设法用其长避其短。这意味着研究者获得微观数据后要首先根据特定研究目的评估数据的适用性。一般说来,抽样和调查等环节的误差会影响统计结果,因此抽样调查数据在做描述性分析时存在不足,但如果用来做结构性分析,误差的影响就会显著减轻。不懂数据特点而随意应用和解释微观数据结果会导致错漏百出。练好评估数据的能力是认识国情和做好研究的必要条件。

举个例子:某研究机构在6个大城市做劳动力市场调查,抽样原则为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对调查过程做了严格控制。但调查误差仍是难免的:被抽中的年轻户主家庭,更可能外出购物、聚会或旅游,在家的概率小于老年户主家庭。调查员上门三次还找不到,允许换户。这样一来,老年人家庭进入样本的概率就高于其在人群中的真实比例。假定这些大城市真实老龄化是15%,最终产生的样本中老年人比例可能接近25%。

熟悉数据产生过程的学者,一方面会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降低抽样和调查环节的误差;另一方面在使用数据时设法避开描述性统计分析,偏重于结构性分析。比如,分析城市退休人口和工作人口的行为、消费、时间安排等方面的差异。其结果不会因样本里有更多老年人而被扭曲。那些不熟悉国情又不懂数据产生过程的学者,很可能得出轻率的结论:中国城市的老龄化接近25%,媒体甚至会联想出养老金账户面临破产。

(二)数据的质量与可信性

数据是大多数学者认识国情和研究对象的手段。数据不真实或者误差大既会误导作者,也会误导读者。中国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质量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国学者存在对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过分贬低的嫌疑。很多做抽样调查的学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数据,随口批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准确,哪怕这个研究团队仅仅在两个县做了不到2000个观测值的抽样调查,就敢自信地报告自己的结论。其实,国家统计局有最庞大的调查体系,调查队伍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再加上老百姓对政府比较信任,抽样和调查的便利程度是任何学者的

团队都无法相比的。然而,2010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收紧了对微观数据的开放,对已经形成开放预期的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种退步。学者无法从统计部门获得微观数据,就会自己做抽样调查,以致昔日的数据使用者现在都成了批评者。

要熟悉数据的产生过程才能评估数据的质量与可信性。比如,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传统的资本与劳动投入不再能支撑高速增长,下一阶段的增长将更加依赖科技进步和创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大家都熟悉两个指标:R&D投入数量和专利授予量。中国的科研体制是模仿苏联,这个体制自身缺少激励机制,生产率低,假冒伪劣严重。由于苏联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低,科研机构与企业都是追随欧美发达国家,模仿发达国家已有的科技产品,偏技术,轻科学。

作者曾经在北京某区科委调研,接待的官员坦承:90%的专利无法转化为真实产品。既然这些专利没有用处,为什么会有人申请它?这个官员回答:可以评职称。专利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像论文一样,算是科研成果。当我们看到《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历年专利数量时,要对这些专利的真实价值打一个折扣:仅仅是手机外形的设计就有成千上万件专利。这是体制诱导出来的无效率的“精明”。

(三)环境与模型

对那些规范经验分析的研究者来说,熟悉事实之所以重要,一是决定了模型的设定,二是决定了数据结果的解读。模型设定时,变量的选择和区分要有事实或常识作依据。当数据呈现在学者面前时,自身并不会做区分、讲故事。只有熟悉各种相关事实,才能依据事实做分类,使数据发挥效能。

中国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即使是长表问卷,也不过设计了几十个变量。那些熟悉国情的学者利用地区差异、队列差异、人群差异和调查时间差异等,做出千变万化的设定和精彩的研究。比如,有个国外学者想研究中国婚姻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便以少数民族为观测对象。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女性有优待,所以少数民族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和家庭内具有谈判优势。然而,中国的区域差异显著,每个省都可以在计划生育条例基本精神指导下设计本省的差异化政策。除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差异,还有少数民族内部执行政策的差异,这就可以设计并区分出更多的差异化群体。一个国外女学者

在谈论她的研究设想时,我们给她指出了这个事实,她如获至宝。然而,几年过去了,也没有见到她的文章出来。今年见到黄炜等做了类似的研究,采用了同样的思路。^⑨看来,哈佛经济系的博士生及其指导教授们,在认识中国国情上确有过人之处。

三、案例分析

就认识国情这个目的来说,案例分析既能单独使用,也可以作为理论和数据分析的有效补充。案例通常来自专门的调研和考察,也可以来自日常有心的观察。下面以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的变化和一些体制性障碍为例说明案例分析的必要性。

(一)劳动力市场态势的变化

2004年以来,每年春节后企业都在喊缺工,供不应求取代了2002年以前的“就业困难”,成了一个基本态势。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城市到处是招工广告;城乡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在上升;每到春节,车站、码头、机场等地到处是涌动的旅客。从农民工流动的规模及变化中,我们能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态势作大致准确的判断。政府劳动部门的官员很清楚劳动力市场供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他们又以部分群体的就业困难为由继续发出“就业困难”的呼声,这是特殊的条块分割体制诱导出来的部门利益,研究者不可被这种声音所误导。

2015年12月,我们到福建西部一个城市调研。该市财政局长在交谈中提供了一个信息,辅助证实了我们对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态势的判断:这个城市的失业金缴费积存了8亿多元,由于只能用于促进就业和预防失业,而城市实际失业率只有2%,没有需要帮助的再就业对象,这笔资金成了死资金。我们再向国家人社部的专家求证,确认了同样的事实:中国的失业保险基金有巨大的积累且花不出去。

由于工资快速上涨和缺工,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会积极寻找工作岗位,真实失业率很低。对于那些没有缴纳失业保险的农民工而言,缺少失业保险反而成了他们不愿意失业的原因。失业率低,领取失业救济的人很少,占工资水平3%的缴费就在政府社保部门不断盈余和积累,越来越大。2015年3月,国务院把失业保险缴费率由3%下调到2%。

(二)体制障碍

中国仍处于转型过程中,改革尚未完成,旧体制障碍让大多数中国人都感到痛苦。^⑩究其原因,主要有“条块分割体制”、“价格体系扭曲”等。

北京市现在有2170.5万人,一直为交通拥堵、水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而苦恼。我们在研究北京市昌平区流动人口时发现,该区与朝阳区交界处有很多断头路、断头桥。昌平区边界处的社区开发商在设计进出小区的道路和桥梁时,虽正对着朝阳区,但朝阳区政府却不愿与昌平区居民“互联互通”,而是在自己一侧用建筑物堵住了这些延伸过来的道路或桥梁。北京市存在无数这样的断头路和断头桥,降低了车流速度,造成交通拥堵。如果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打破城区间的相互封锁,优化现有的道路和桥梁,容纳的人数、车辆都会进一步增加,交通拥堵也会得到有效缓解。

北京、上海近年来在驱赶外来人口时,都以人口多、资源环境压力大为借口。观察这些断头路和断头桥后,不难推知:城市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取决于政府的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北京市政府既没有把承载力视为动态变化的,也缺少“向前看”的思维方式,而是将2020年的人口目标人为设定在2300万。这是用“倒退”的手法来“解决问题”。“倒退”比“前进”要轻松得多,对一部分官员来说,“倒退”是个难以抵抗的诱惑。换个视角看这些体制性障碍,也给我们带来希望:如果政府从自身开始改革,那么中国经济还蕴藏着巨大动能。

(三)利用条块分割体制

城市发展使郊区土地资源变稀缺、地价暴涨,上级政府希望把郊区农民的土地抓在手中,这是“土地财政”的经验内容。但有个城中村村的村支书,赶在上级政府之前把全村数千亩土地都开发成房地产——小产权房,上级政府想拿他们的土地时,发现全部被占用了。这些小产权房,是大片的高档住宅小区,是美轮美奂的楼堂馆所,这里甚至接待了很多重大涉外活动。城市政府在清理小产权房时左右为难:拆,太大、太多了,下不了决心;不拆,其他小产权房主都盯着这家呢。不难想象,上级政府官员对这个“不听话”的支书有多么不满,但在村民眼里这个支书是帮他们维护权益和带领致富的英雄。显然,这个支书摸透了条块分割体制,主动出击,游走在体制接缝处。

(四)一个村支书的博弈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中国政府体制的特色,也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破解的改革难点。对上级政府设计的政策,下级政府或部门执行时会根据

自己的需要做调整。下面我们观察京郊某城中村刘支书如何执行上级政府压减外来人口的硬任务。刘支书采取的手法很容易预期:一是执行,二是谈判。

刘支书先拆掉了村里的一个农贸市场,减少了3000多外来人口,对村民的工作生活既没有影响又完成了上级安排的任务。至于村民出租房里的2万多外来人口,那是村民的衣食来源,则要保护。刘支书清楚,今年顺利完成了任务,明年上级政府还会分配给他更多压减人口数量的任务,所以他必须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让上级政府知道,明年再压减人口就会损害村民的生计,他会被迫站在村民一边。

但是,这一次上级政府不仅决心大,也看得更远,即瓦片经济不值得留恋。虽然靠着翻盖住房出租,能获得固定的收入,但这些村民天天坐在家收租,缺少知识技能,其实是很脆弱的群体。反思一下西亚石油出口国,依靠单一石油经济,想转型却找不到路径,“在石油里淹死”,就能理解瓦片经济的前途。

刘支书也承认瓦片经济的弊端:我们要求村里的年轻人务必出去工作,在外面学到真本事,不能像父母那样死守着房子,看起来有收入,其实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相当于坐牢。能够在市里找到工作的青年,村委会每年奖励他2000元。

学者喜欢用大样本数据来捕获事实,但案例应用得当,同样起到解剖麻雀的作用。以研究城中村问题为例,北京有城中村,广州有城中村,换句话说,中国任何城市里都有城中村,每个城中村里都有一个“刘支书”,他们面对着同样的难题,也有同样解决问题的慧黠。这是中国特殊的条块分割体制和模糊的土地产权集体所有制联合诱导出来的。

四、思考方法:反事实假设

转型期间不断推出各种新政策,思考和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既需要熟悉国情,也离不开反事实假设的思考方法。比如,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学者面对增长速度下降通常会建议政府扩大投资和银行降息。我们可以继续追问:政府投资投给谁?效果怎样?政府投资的钱来自哪里?如果政府不投,这笔钱能得到更好的运用吗?如果研究者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运用中央财政投资的过程有深入细致的研究,了解更多实际投资的案例,善于运用“反事实假设”的思考方法,在提出政策建议时或许会更谨慎一些。

2002年,国企改革进入收尾阶段,加入世贸组织对拉动出口与增长的效果也开始显现。大家都认为困难时期过去了,但全国很多城市突然出现了“资源枯竭”。到地方调研后发现,原来是一些老工业城市的国有资源型企业留恋条块分割体制下的既得利益,不愿意改革:按照既定改革方案,原属中央部委的国企要划归地方政府。这些国企和地方政府联手,通过“哭闹”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于是,以国家发改委为代表的“中央部委”就给这些资源型城市投入财政资金,用于“救助”项目。

东北有一个城市“哭闹”得厉害,得到了中央部委的特殊救助。不仅获得“转型试点城市”的各种政策优待,还申请到多个部委的25个大项目,72亿元的资金。其中一个煤炭露天矿旁的矸石山治理项目。在当地调研过程中,我们得到一个信息:有家外地的民营企业正在和城市政府协商,想承包这个矸石山种植金银花。且不说种金银花的经济价值和税收和就业上的贡献,仅仅是防风固沙的效果就比一般的植树种草要好得多。然而,该市政府一边用谈判拖着这家民营企业,一边等待中央有关部委批准这个治理项目。他们最终申请到了治理项目,自然也就没把矸石山承包给这家民营企业。如果矸石山承包出去了,该市政府用什么理由向中央政府要这1.5亿治理费呢?

知道了这家民营企业家的存在,你还会赞同中央政府投入经费治理矸石山吗?这不是什么“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是对市场的破坏。在所有的可选方案中,做了最坏的选择。其实“公共物品”也同样可以通过市场来有效率地提供,这是大多数书斋里的学者想象不到的。

当时,我们从理论出发,推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欺骗中央部委,要资金,要项目。可是,中央某部委的一个干部正在该市挂职,在私下讨论时,他否定了我们的推测:你们才来调研几天就发现了真相,难道我们这么多挂职干部在地方呆一年都发现不了真相吗?何况我们还有很多干部是从地方提拔上来的。这句话揭开了谜底:没有什么信息不对称。这是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在联手玩“周瑜打黄盖”的游戏。在条块分割体制下,中央政府的钱大都是通过中央部委(“条”的代表)花出去的。如果地方政府不向中央部委申请项目,中央政府的钱怎么花出

去? 哪怕明知道是没有效率的项目,中央部委也会假装那是个好项目。地方政府都不求中央部委了,这些部委的权力也就自动萎缩,“跑部钱进”的盛况就自动消失。也因此,这些部委没有积极性去改革“条块分割体制”。

做个反事实假设:如果中央政府少从民营企业抽税,民营企业就会多积累,会改进技术以推动产业升级;僵尸企业被“创造性的破坏”,不再占用与浪费稀缺资源,给有生命力的企业腾出空间,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这是正常的发展路径,^[7]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就会健康得多,今天面临的困难也会小很多。征税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补贴则制造和维系了僵尸企业,政府背上了持续补贴的重担,更糟的是这一做法销蚀了1998—2002年的改革成果。2003年开始搞振兴东北,大量投资,核销呆坏账,今天看来,这就像旧体制下大多数无效投资一样,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十多年的“振而不兴”引起东北的一部分官员开始主动反思这个“哭闹模式”:向中央哭闹要钱,如果不能伴随着积极改革,消除旧体制障碍,促进民营经济兴起,那么尽管能解决一时的困难,却带不来可持续的发展,从长期看,东北还是会落在后面。那批善于向中央哭闹却不善于改革的官员在此期间升迁了、调离了、退休了、死亡了,但东北人民还在那片土地上工作、生活。就是这些“哭闹官员”,耽误了改革机遇,制造了东北的困难,老百姓是他们施政的最终受害者。

亚当·斯密在分析经济增长时有个正确的方法:当政府保护财产权,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经济增长就有了动力,可以实现潜在增长速度;如果政府偏了心,为某些人量身定制保护政策,就会扣减和阻碍经济增长。最终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正面推动和负面阻碍力量的对比。由于各个市场参与者积极创造的力量更大,超过了那些阻碍力量,从而“治疗”了政府的乱干预,使经济持续增长。

那些为少数人量身定做“保护”的官员经常声称:正是这些保护,才带来了增长。会在头脑里作反事实假设的人才不会被这样的宣传所迷惑:如果取消了保护,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分配会更公平,高工资、低物(房)价、普遍富裕就能更早实现。其实,常识比经济学理论更强大。

五、各种经验方法

(一)熟悉事实,谨慎推论

某一博客在谈论前段时期的“去产能”时,针对减少煤炭产能过剩有如下论断:“目前的制度环境还承接不了去产能。……去产能就得关矿井,关矿井职工就得下岗,职工下岗就要给一笔失业保险,但社保局又没这么多钱,向商业银行借款又会造成坏账,这个后果承担不了。”^③

根据惯例,政府要关矿井,通常是设定技术门槛,关闭那些技术条件差、不安全的小矿井,这些矿井雇佣的几乎全是农民工。农民工流动性强,近些年的就业形势好,真实失业率低,农民工没有缴纳失业保险的积极性,参加失业保险者不超过10%。农民工不会为了几百元的失业救济金去放弃到处都有的数千元工资的就业岗位。一旦这些小矿被关闭,农民工很快会在其他部门找到新工作岗位。至于说“社保局又没这么多钱”,这明显是在“拍脑袋”。前文已指出,中国的失业基金越积越多,无处可花,以至于国务院下调了缴费率。

经济学是个局部科学,多迈一步,就是深渊!掌握事实比理论推测可靠,用事实打败推测比铁锤击碎瓦器更容易。长链条的推测使每个环节都有错漏溜进来。要抵制这样的诱惑。

(二)交谈:寻找那个骑手

中国经济近来放缓了速度,但增长的势头仍在。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使大多数人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存在很多伤害经济增长的各种“缺失”,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自动医治或修复了这些伤害。如果赛马得了冠军,可以推断,在中国各级政府内会有成千上万的优秀“骑手”:那些懂经营、善管理的干部,在实际操控和运作着中国经济。

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要在生活中多发现这样的“骑手”,与他们交朋友,听他们讲故事,看他们的文章,他们是真正的专家。他们讲述的案例和做法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实”或“准事实”,能为你提供“识别策略”;他们对体制、政策和做法的反思与评估,则为你寻找“政策含义”提供了思路。

要特别指出一个“另类”事实:中国政府部门内有两类官员,一类是“做官的”,另一类是“做事的”。后者说起自己分管的事务如数家珍,无论是其想法还是其做法都让人如饮琼浆。前者则在事实与问题面前往往一问三不知。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存

在,但从经验上看,东部沿海地区“做事者”众多,而在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中西部,大家争当“做官者”。

(三) 筛选信息

因为访谈对象总是人,有自己的利益和关注点。我们会“问自己想问的”,但被访谈者可能“说自己想说的”。经常调研者都有这样的经历:访谈对象谈起成绩来滔滔不绝,对存在的问题却环顾左右而言他。对这样有偏的信息要有辨别力,要能“去伪存真”。比如,到东北去访谈,那里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最可能给你的答案是:中央政府投入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大;核销的呆坏账不够多……你不能轻信,更不要做他们的传声筒。民营企业没有得到政府的救助和补贴,也能在市场上存活下来。

有些经济学家对企业家预期过高,好像他们不仅是创新的能手,也是解决各种社会困难的高手。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企业家也不例外,他们最优先的选择是追求垄断地位,游说政府给自己保护。政府官员只有足够明智,坚决鼓励自由竞争,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政府只有不去满足企业家的非分要求,才能把他们推到正确道路上。亚当·斯密对企业家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东北的国有企业最需要“明智的政府”给他们一个推向市场的逼迫,而不是父爱主义的救助,否则只会助长他们的懒惰和一轮轮地哭闹。

(四) 阅读

阅读是学者获取信息、认识事实、增长理解力的最重要途径。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不仅要研读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政府工作报告,还要主动去研读一些官员的文章和著作。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沿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开辟的道路前进的,这决定了中国今天的国情与基本态势,所以要熟悉那一代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和工作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这些年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中心从未动摇过,而“向前看”既是工作方法,也是基本原则。

细心辨识官员的文章和讲话会发现,专家型官员总结工作得失的文章是认识国情的重要来源,而非专家型的官员的文章往往着力为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代言。他们“说他们想说的”,如果你掌握了足够多的事实,还是能纠正这种有偏差的信息,解

读出真实信息的。例如,一些官员在叙述东北振兴所取得成绩的文章中透露了中央政府核销的呆坏账,给东北的投资、补助和优惠政策等。

学术同行的文章则既提供了信息,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由于转型与改革这个背景,市场与政府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中国实现了约10%的增长速度,这当然是个值得自豪的成绩单,但未必是政府“有为”的结果,更可能是政府“放手”和“松绑”的结果。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或许更高,由于旧体制障碍的束缚,实际只实现了10%。其实,论证因果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六、结论与含义

认识中国的国情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只有把经济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相互结合才是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社会上的事实又反过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和解释能力。如果把认识国情当作一个次级目标,它同样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一个在理论方法上训练有素又经常到现实生活中观察的学者,理论与经验事实会在其头脑中相互诱导、相互印证,多次重复这个过程,不断精炼化认识,最终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准确判断。长期运用这套方法,使我们对国情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于真实。

对大多数学者来说,认识国情最直接的激励是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近年来,随着以“可信性革命”框架为主流的经验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8]研究者认识国情的兴趣越来越浓。认识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学者终身面对的最大挑战和功课,即使是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会承认应对这个挑战是艰难的。因为环境总在变,在不断提出新问题;学者会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每次都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知识环境,都需要从头开始认识研究对象,由外行变成专家。

面对这个挑战,学者不仅要虚心,要下功夫,还要经常检讨和调整自己的方法策略。中国每天都在发展与改革,我们都是亲历者、观察者、思考者。改革与发展给我们提出问题并激励我们回答。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也是客观存在,我们应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从多个视角来研究它、认识它。这些不同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应该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决定了接近真理的认识必然是趋向于统一和收敛的。

认识国情确实类似于盲人摸象。修改一下那则寓言的条件,能得到较为乐观的结论:允许盲人继续摸下去,他们迟早都能得到关于大象形状的正确判断。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准确认识和把握不仅是提出政策建议的前提,也提高了学术研究的价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锐意进取的改革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有消极观望、坐失改革良机的遗憾。每取得一点成绩,都是多少人耗尽智慧与心血的结果;而一个懒政或庸政,则可以使某些部门或领域出现显著的倒退。认识国情虽然艰难,也要坚持不懈研究下去,如此我们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积极建言者和推进力量。

注 释:

- ① 参见哈佛经济系微观经济学讲义,Econ 2010A,Edward Glaeser 教授,2014年秋季学期。
- ② 近年来一些大城市推出的各种限制外来人口的政策,比如“拆违打非”、“五证联审”、“停办民营幼儿园”等,对城市的用工企业和外来劳动者来说,这些政策就是“故意刁难”。某些城市政府官员则毫不讳言:通过“提高外来人口的生活成本”、“压缩他们的生活空间”实现“控制人口无序增长”这个目标。

- ③ 见许善达的博客文章:“三驾马车难拉经济 供给侧改革 减税最乐观”,<http://blog.ifeng.com/article/44542826.html?touping>。

参考文献:

- [1] Heckman James. Gary Becker: Model Economic Scientist [R].IZA DP. No.8827,2015.
- [2] Friedman,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145-178.
- [3] 卢锋.中国农民工的工资走势:1979-2010[J].中国社会科学,2012,(7):47-67.
- [4] 蔡昉. 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 [J]. 中国社会保障,2007,(5):24-26.
- [5] 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开放导报,2007,(3):50-56.
- [6] Huang, Wei, Yi Zhou. One-Child Policy, Marriage Distortion and Welfare Loss [R].Working Paper. Harvard Economic Department,2016.
- [7] Davis Steven J., R. Jason Faberman,John Haltiwanger. The Flow Approach to Labor Markets:New Data Sources and Micro-Macro Link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7,(20):3-26.
- [8] Chetty Raj. Yes, Economics Is a Science [N]. The New York Times,2013-08-20.

(责任编辑:许桃芳)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ZHAO Quan¹, WU Yao-wu²

(1.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China;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u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China)

Abstract: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stylized fa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ways to understand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from two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analytical method and the empirical process. The analytical method includes theoretical analysis, data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And the experience process includes reading, observing, talking and thinking. In order to grasp more objective facts and be familiar with the study object and its environment, we need to not only integrate the use of these methods, but also persist in it for a long tim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finally achieve the research goal of "important issue, rigorous argument and novel story".

Key words: stylized fac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 economic